

项目编号： JG2405

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
结项报告

项 目 名 称	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比较研究——以统编版教材和《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为例		
项 目 类 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自由申报 <input type="checkbox"/> 招标		
项 目 组 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硕士生组 <input type="checkbox"/> 博士生组 <input type="checkbox"/> 招标组		
项 目 负 责 人	周雨微		
所 在 院 所	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手机	13701565333		
项目负责人信箱	zywei5@163.com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刘幸		
指 导 教 师 职 称	副教授		
指 导 教 师 单 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学办公室

填 表 说 明

- 1、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如实填写“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结项报告”（简称“结项报告”），并提供必要的附件材料，作为项目验收和评估的主要依据。
- 2、 填写“结项报告”要求保证内容真实，数据准确。所有栏目必填，不得有空缺，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
- 3、 封面总编号由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统一编写。
- 4、 “结项报告”用 A4 纸打印，一式一份，于左侧装订成册。

一、总结报告（3000~5000 字）

项目综述：

本项目以探究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差异及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化的启示为核心目标，选取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含 67 篇古诗文）与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含 78 篇汉诗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内容分析法，从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个核心维度展开系统比较，旨在为我国语文教材建设与古诗文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内容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基础构建量化分析系统。研究团队对 145 篇古诗文样本进行了全面编码，从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为确保研究信度，四位编码员经过系统培训，通过预编码测试与一致性检验，最终编码一致性达到可接受水平。此外，研究还选取《鸿门宴》《登岳阳楼》《兼爱》三篇共有文本进行深入的个案比较，实现了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的有机融合。

研究发现，在选文维度上，两国教材呈现出“广博”与“聚焦”的鲜明对比。在注释与插图设计方面，两国教材展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学习提示系统的比较同样揭示出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这些编选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与教育逻辑。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为我国语文教育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启示。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样本范围上未能涵盖两国多个教材版本，在研究方法上缺乏课堂教学的实证数据支撑等。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多版本、多学段的比较分析，引入教育心理学理论深化对学习机制的理解，并密切关注数字化时代教材形态的创新趋势。

总体而言，中日教材差异源于文化传承机制与教育理念分野，中国“母体自觉”与日本“受容智慧”各具特色，唯有相互借鉴才能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创新发展。

文献综述：

（一）中国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研究

自 2019 年《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颁布以来，至 2022 年秋季，全国所有高一年级已全部正式使用统编版教材。国内近年来对于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的研究，基本皆以统编版教材作为研究对象。

刘宇颂（2021）研究了建国以来语文教材中古诗文选编的发展历程，总结出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诗数量增多、朝代选取范围科学化、题材分类经典化、强调以生为本的编排

理念等特征。程鸣、陈捷（2020）从选文数量、篇目、文体、时代、作者、版本、编排等方面对统编本教材中的古诗文选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教材在编排布局均衡性、选文广泛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李维（2023）指出教科书通过群文与单篇的结合、图文互映等手法，有效融合古诗文于学习任务群和人文主题中。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概括性地对统编版教材编选进行特征总结，缺乏对支撑特征的具体案例的详细阐释。

在文言文选编研究方面，晏琼芬（2021）总结出文言文选文篇目占比较高、体现经典与创新相结合的理念、选文时代跨度大、作家群体分布广泛、选文文体类型广、内容题材丰富多元等特征。查娇娇（2022）提出教材的选编体现了科学性原则、思想性原则与整合性原则。杨钰雯（2021）特别针对文言文部分的辅助系统的编排进行了研究，突出了辅助系统在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比较研究方面，王文君（2023）对比了统编版与苏教版教材，指出统编版教材在选编方式上更加坚固人文性和工具性、在助学系统上更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在课后习题上越发强调综合性与实践性、在设计理念上从注重“文学教育”转向注重“文化教育”等特色。

然而，古诗词选编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针对高中学段，仅有牟慧英（2021）对唐宋古诗文编排进行研究，张光敏（2022）对古代诗歌选编进行对比，指出了编排分布不合理、选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总体而言，存在文言文选编研究与古诗词选编研究严重不平衡的问题，高中学段的古诗词研究尤为稀缺，且缺乏对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和教师教学效果的深入考察。

（二）日本国语教材古诗文选编研究

2006年，日本《教育基本法》进行了时隔60年的修订，其第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传统与文化的国家与乡土。基于此目标，日本规定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加强学习汉文，所有高中生都必须学习古典文学。2013年正式实施的《高中学习指导纲要》明确规定了“国语综合”的“古典文学”中“古文”和“汉文”的比例，不允许出现不修读汉文的偏科情况。

青山勇树、中川逾分析了日本国语教材对中国古诗词的选用及汉文学习的方法。但以上研究多立足于日本国语教科书中的中国古代选文，而少有学者对日本国语教材中选入的完整古诗文篇目（汉文和古文）进行系统化梳理。

（三）中日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的比较研究

在中日语文教材比较研究领域，付宜红的《日本语文教育研究》等专著较为全面地呈

现了日本国语教学的现状以及教材设计的亮点。堀诚（2023）细致梳理日本语文教材中收录的李杜诗歌、鲁迅小说等篇目，翔实考证两国教材中相同选文的不同呈现方式和编选理念，为此次研究提供新思路。

周葵葵（2007）、李梦娴（2021）对中日语文课程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国都强调母语教育对培养民族感情、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但日本表现出更鲜明执着的态度；两国都强调语文学习的实践性，但日本坚持言语教育立场，对语言应用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曹莹（2020）从古诗文选文系统切入，总结出“古典文学系统化、独立化教学；形象性与批判性结合；学习情境应该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等教材编著经验。罗敏（2021）指出统编版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而光村版偏重工具性；统编版重视基本策略、方法的学习，光村版重视内容学习。

在 2013 年正式投入使用的来自 9 家出版社的 23 种日本国语教材中，共选取中国古代诗歌 38 首，且均为唐诗，以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为主，集中于李白、杜甫和王维等诗人。而在短文的选取上，以宣扬诸子百家思想的议论和成语寓言故事为主，先秦两汉的著作居多。所选篇目往往言简意赅、可读性高，符合日本高中生的汉诗文阅读理解水平。

李诗韵（2019）发现日本高中国语教材多选录唐诗中的绝句，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于诗歌的情感偏好；山水田园和自然风光类诗歌的大量入选，在于日本自古以来向往简素、自然的审美观。徐程成（2022）指出中国语文教材呈现的诗歌主题更偏重个人与国家的关联，诗人在逆境中的抗争精神；而日本教材选录的汉诗则常常表达孤独感、寂寥感及人类存在的脆弱无常、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淡泊与乐观，这也和日本追求“坵寂、物哀、幽玄”的美学观相契合。陈诗佳（2024）认为日本教材注重“训读”传统，多通过图文并重、文史地结合的方式设计助读系统。

综上所述，关于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比较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为我们设计研究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参考。然而，少有学者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聚焦中日语文教材的发展概况和选文依据，少有学者以表格形式对古诗文选文的数量、作者、时代、体裁、注释、习题、插图等要素进行分类统计和编码分析，且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同时，2024 年东京书籍版《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的正式流通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视点。基于此，本研究希望关照不同的文化传统，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的不同特点，并探讨差异背后的主要原因，为我国教材编写提供经验。

项目研究计划要点、执行情况、主要进展：

一、项目研究计划要点

本研究以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东京书籍版《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为研究对象，系统比较两国高中语文教材在古诗文编选方面的异同，旨在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教育理念差异，并为我国语文教材编写与古诗文教学提供跨文化借鉴。研究计划围绕“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特点差异；差异成因的社会文化及教育观念根源；对我国教材编写与传统文化教学的启示”三大研究问题来展开，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第一，明确研究对象与样本范围。中国样本为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下，选择性必修上、中、下）共5册中的67篇古诗文；日本样本为东京书籍版《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中的78篇汉诗文。两者在选编内容、课程理念、文化功能上具备可比性。

第二，构建多维度分析框架。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语文学科教学知识（PCK）理论、阿普尔课程文化观及叶嘉莹“兴发感动”说，确立“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等核心分析维度，下设年代、体裁、题材、注释形式、插图类型、拓展提示等类目，设计并修订“编码手册”。

第三，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与政策背景，以内容分析法对145篇样本进行量化统计与质性比较，并结合典型案例（如《鸿门宴》《登岳阳楼》《兼爱》）开展深度文本分析。

二、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自2024年9月启动以来，严格按三阶段计划推进，执行情况如下：

前期（2024年9月—12月）：完成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团队系统检索CNKI、北师大图书馆等数据库，梳理相关文献，涵盖中日教材比较、古诗文选编研究等多个方向，并撰写文献综述，为此次研究设计编码条目寻找学理依据。

中期（2025年1月—6月）：完成样本编码与数据分析。组织4名编码员进行统一培训，通过预编码检验确保一致性。使用SPSS 26.0对145篇古诗文进行频数统计与交叉分析，形成超30张统计图表，完成中期报告。

后期（2025年7月—9月）：深化比较研究与成果转化。开展典型案例的平行文本分析，完成《鸿门宴》《登岳阳楼》《兼爱》三篇课文的对比；撰写结题学术报告。

研究过程中，团队定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主题研讨，以期确保文本分析、数据统计、图表绘制均依据编码手册执行，过程清晰，可追溯。

三、项目主要进展

通过对中日教材古诗文样本的系统编码与比较分析，本项目在以下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一）揭示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结构性差异

在选文方面，中国教材涵盖先秦至清代，突出宋代（17篇）、唐代（16篇）与先秦（16篇）作品，体裁多样，兼顾诗、词、论说文与史传文；题材上重视哲学思辨（13篇）、人物传记（10篇）与政治建设（7篇）。日本教材则高度集中于先秦（31篇）与唐代（24篇），体裁以近体诗（15篇）和诸子散文为主，题材突出哲学思辨（24篇）与即景抒情（14篇），明显回避政治主题，体现“去政治化”倾向。

在注释与插图方面，中方注释体系完备，注释内容深入，89条注释的《鸿门宴》为例，涵盖文化典故与句式语法；插图比例较低（35%），以历史场景与人物肖像为主。日方注释实用性强，侧重字词释义与语法标记（如训读符号），插图功能性强，常见地图、器物图等，辅助跨学科理解。

在学习提示方面，中方重视文本评价拓展（17篇）与写作训练（26篇），强调朗读与核心素养培育；日方则侧重同主题拓展（17篇）与翻译练习（39篇），淡化背诵，注重跨文化关联与现实议题讨论。

（二）从社会文化与教育观念层面阐释差异成因

研究从母体文化与受容文化差异、审美传统、语言教学观等角度深入分析：中国作为文化母体，强调“文以载道”与家国情怀，教材承担文化传承使命；日本作为文化受容者，聚焦汉诗文的本土化吸收，体现“物哀”美学与实用主义教学观；教学理念上，中方注重经典浸润与读写结合，日方则以训读法降低语言门槛，强调批判思维与现代关联。

（三）对我国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启示

基于比较成果，研究团队为我国语文教材选编与古诗文教学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强化学科融合与现代关联。借鉴日本教材中的历史地图、跨文化议题设计，增强古诗文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融合。其二，优化注释与插图功能：在保持注释深度的基础上，增强视觉辅助与语境化解读。其三，平衡选文定篇与时代覆盖：适当增加元明清等时期篇目，避免宋代以后“认知断层”。其四，推动教学方式转型：从“背诵—翻译”传统模式转向探究式、比较式学习，增强文化对比与批判思维训练。

本次课题已按计划基本完成研究内容，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后续将进一步推进教学成果的应用转化。

项目特色、创新点及研究取得的成果：

（一）项目特色及创新点

1.研究视角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

本研究立足东亚文化圈语境，以其中具有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打破单一国家教材研究的局限，通过跨国比较揭示教材中古诗文编选的共性与差异。对在两国教材古诗文编选进行比较之后，不单停留在表层现象，而是通过对教材改革相关政策、中国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日本高中国语教学大纲等文件材料的研读及考察，再结合课程文化理论、中日文化背景渊源、语言学习观念等多个角度，深入挖掘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差异的缘由。同时，本研究始终锚定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改革需求，聚焦“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在分析日本教材对中国古诗文的本土化改造经验的基础之上，反思我国教材在文化传承中的优势与不足，实现“国际借鉴”与“本土优化”的深度发展。

2.研究对象聚焦中日两国最新版教材

在新时代教材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选取中日两国最新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国统编版高中教材于 2017 年开始统编，2019 年编审完成，2022 年全国普及使用；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于 2024 年广泛投入使用，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新版国语教材。两版教材均能反映出当前中日古诗文教育的政策导向、教学理念与实践趋势，避免因教材版本陈旧导致研究结论滞后的问题。此外，项目开展前期我们关注到已有相关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教学文本的选编上，而对教材中的助读系统的变化更新鲜有问津。但是，教材在为学生提供文质兼美的古诗文选文的同时，其中的助读系统对于促进学生自学、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中日两版教材中相关古诗文的选文及注释、插图、学习提示等助读要素的编排与呈现，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全面探究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特点和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

3.研究方法融合定性分析与量化编码

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本研究在比较研究的视野和大框架下，首先梳理国内外现有研究现状，研读中国《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日本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等政策文件，对中日教材进行初步了解；接着统计整理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67 篇）、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中的汉诗文（78 篇），对 145 篇样本，分别从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这 4 个维度进行内容分析，以对比解读中日两版教材呈现出的编选特点；还特意选取两版教材中的共有篇目《登岳阳楼》《鸿

门宴》《兼爱》进行具体案例分析，进一步佐证量化编码得出的结论。研究将质性分析与量化编码相结合，旨在更准确、客观地对比归纳出中日高中国语教材中的古诗文编选特点与差异，以探索中国语文教材古诗文部分的编选优化和教学改进路径，为中国教材编写者、一线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师等群体提供语文教育领域跨文化关照的视角以及可参考借鉴的研究案例。

4.理论框架构建教材比较研究新范式

本项目在研究理论框架上也有所创新，以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语文学科知识论PCK、阿普尔课程文化观、叶嘉莹“兴发感动”说为理论基础，创新性地构建教材古诗文编选的“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维度编码框架。其中，参考了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中最重要的“认知过程维度”（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对编码表类目制定科学的规则 and 标准；PCK 理论从“学科内容-教学法知识”的视角，辅助分析教材编选与学生接受的适配性；课程文化观理论助力挖掘教材背后的文化权力逻辑；叶嘉莹学说则用于对比古诗文情感传递策略。四大理论覆盖研究全环节形成闭环，为跨文化教材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范式参考。

（二）研究取得的成果

1.理论成果：揭示中日教材编选差异，提出传统文化转型启示

首先，本研究对比总结出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特征与差异。在选文维度，中日教材均以先秦、汉、唐诗文为核心，此外中国教材还较多地选入宋代作品；体裁上，二者皆重诗歌与论说文，中国更偏重古体诗和词，日本则偏重近体诗与先秦诸子散文；选文题材上，均青睐哲学思辨、人物传记、政治建设类，此外日本还偏好即景抒情类。在注释与插图维度，两国均用页末注，但中国教材注释内容更丰富，日本则侧重实用性而拓展性弱；两国教材的插图均不多，以历史场景、人物肖像为主，多为彩色独立插图。在学习提示维度，两国拓展阅读提示都较少，中国重文本评价拓展，日本重同主题拓展，均强调朗读而淡化背诵要求；中国教材的文化延伸提示侧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关联，日本的较薄弱；中国教材相对重视写作练习，日本则重翻译练习。

其次，从社会文化渊源和语言学习教育观两大视角探究了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差异的深层原因，其本质上是文化传承机制与教育功能定位差异的呈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层面，中国作为汉文化母体，教材构建起贯通五千年的文学史谱系，既彰显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情怀，又包含纵情山水的隐逸哲学，旨在涵养学生的文化认同。而日本作为文化受容方，

其教材呈现出选择性重构、文化过滤的特征：对盛唐绝句的集中选录既延续“永恒的唐土情结”，也暗合和歌俳句的表达形式；对道家哲学与个人化抒情的侧重，则契合了“知物哀”的民族审美心理。同时，当代文化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野，中国课标强调挖掘古诗文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日本则注重将汉诗文转化为现代公民素养的培育资源。

最后，在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提出了建议。可以从注重学科间融合与本土化融合、注重古诗文文本间互通与作者间贯涉、注重古诗文定篇的平衡以及注重古今文化渗透与学生成长化育等方面来优化中国教材中的古诗文编选。此外，在教学实践中也可以有所改进，可以朝构建跨文化比较的教学框架、优化朗读与背诵设计、深化文化延伸与跨学科融合等方向努力。

2.成果输出：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

其一，完成《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比较研究》项目学术报告（共 4.5 万字），报告包含引言、研究方法与过程、研究结果分析、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差异原因探究、具体案例比较、对我国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启示、研究结论与展望、结语以及所有参考文献等部分。

其二，撰写学术论文《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比较研究》1 篇，从文化传承视域出发，对比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中的古诗文选文编选情况，从选文的年代、体裁、题材等方面分析各自特点，并基于社会文化与教育理念视角探究差异的成因，进而提出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启示。该论文最终发表于《语文建设》（核心期刊）2025 年第 9 期第 17 卷。

其三，整理得到《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对比表》《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情况编码表》《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情况原始数据》等资料，日后可作为该研究领域内的相关参考工具。

3.学术影响：促进我国古诗文教学和中日文化教育交流

第一，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教材的基本编纂原理，能够为我国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古诗文模块提供学理性的参考和实践性的解读指导。基于对中日两国国语教材的比较，为我国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建议，推动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古诗文教材体系。

第二，能帮助当下中国的高中古诗文教学进一步明晰教学重难点，关注之前被忽视的一些教学要素，完善古诗文教学知识框架，促进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在高中古诗文教学中的落地

和反思，同时深化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师生的民族自豪感。

此外，本研究以多元化、国际化的视野横向对比研究了中日高中国语教材古诗文编选的差异及其缘由，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促进中日在语文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如果推及更广阔的领域，还可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教材中古诗文的编选情况，建构更为全面的中国古诗文教材研究体系。

成果形式（名称）及合作交流情况

（一）成果形式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本项目首先对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国内研究聚焦统编版教材,多围绕古诗文选编的整体性特征、文言文与古诗词选编差异、助读系统设计等方面展开,但存在文言文与古诗词选编研究不平衡、实证研究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古诗词选编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学段的研究尤为稀缺。日本方面,研究多立足于国语教科书中的中国古代选文,对汉文选编情况、诗歌教材录用意图等有所探讨,但缺乏对完整古诗文篇目的系统化梳理。中日比较研究视角日益丰富,涉及课程标准、选文系统、助读系统等维度,为本次研究框架提供了学理参考,但理论基础薄弱,少有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及编码量化分析。

2.建立四维分析数据表

在研究过程中,构建了“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维度分析框架,对 145 篇文本(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 67 篇、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78 篇)进行量化编码。其中,选文维度涵盖年代、体裁、题材等类目;注释维度包括编排形式、内容类型等;插图维度涉及内容类型、形式、颜色、篇幅等;学习提示维度包含拓展阅读、朗读背诵、文化延伸、写作翻译等类目。通过编码,实现了对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特征的量化呈现,为后续比较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3.学术报告《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比较研究》

包含九大模块:引言部分阐述了全球化与跨文化教育趋势、中日文化同源性、古诗文的教育价值及两国政策背景,明确了研究意义与目的;研究方法与过程介绍了对象确定、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内容分析法的运用,包括类目建构、编码与信度检验;结果分析部分重点对比了中日教材在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等方面的特点;接着对中日教材古诗文编选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揭示其背后的文化与教育观念不同;具体案例比较选取统编版与汉文编中的共同篇目《登岳阳楼》《鸿门宴》《兼爱》,从内容编排、注释、插图、学习提示等方面深入分析差异;然后,对我国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从教材编写优化和教学实践改进两方面提出可参考的建议;最后对整个研究作出结论与展望,撰写最终结语,分类列出所有参考文献。

4.学术论文《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比较研究》

以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东京书籍版《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为研究对象,

基于课程文化观与语文学科知识论，从选文年代、体裁、题材三个维度量化分析，对比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的编选特征。发现两国教材差异，源于社会文化特质与教育理念的不同：中国强调意识形塑，日本侧重本土化转化；中国注重文化传承与认同，日本倾向审美熏陶与应试需求。论文得出三点启示：我国教材编选可进一步平衡教化功能与审美体验，增补文化转型期的古诗文经典，增设跨文化阅读比较栏目，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构建兼具传统深度与时代活力的教学范式。该论文最终发表于《语文建设》（核心期刊）2025年第9期第17卷（发刊时间：2025.9.15）。

（二）合作交流情况

借助7月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联盟（INEI）暑期学校的机会，刘幸老师邀请日本广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的副教授Makiko Santoki老师来与项目组成员进行交流。交流伊始，负责人周雨微围绕“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比较”项目主题，向Makiko教授系统介绍了整体研究框架——从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大维度切入，以统编版教材与《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为样本的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的初步发现。Makiko教授听完后高度认可了该目的研究价值，并饶有兴致地询问选题灵感。成员分享道，灵感源于对“同源文化下教材编选差异”的好奇，尤其是日本教材对中国古诗文的本土化改造现象，引发了大家探究其背后文化逻辑的兴趣。随后，双方就初步研究报告中的日本训读符号对古诗文学习的影响、日本物哀文化及古典文学偏好等细节展开了深入探讨。交流尾声，项目组成员结合研究困惑，向Makiko教授提出“日本学生如何学习中国古诗文”的问题。Makiko教授向大家详细解答，介绍了日本课堂多以“训读入门—文脉解析—文化关联”为路径，先通过返点符号帮助学生疏通句意，再结合日本文化语境解读文本，此外还尤其点出汉诗文教学对于日本学生来说更多是以应试需求为导向的。通过本次交流，成员们对日本汉诗文教学实践有了更为直观与深入的认识。

应用前景评价及必要的说明：

（一）应用前景评价

本课题聚焦于我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中古诗文编选的系统比较，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定量编码、案例比较与理论阐释等方法，从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揭示了中日两国在古诗文教育理念、文化传承路径与教学功能定位等方面的深层差异。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应用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建设与政策参考价值

本课题系统梳理了中日教材在古诗文编选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深入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教育哲学。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语文教材的修订与优化提供跨文化参照系，尤其在古诗文定篇平衡、注释系统优化、插图功能拓展、学习任务设计等方面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改进建议，助力构建更具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高质量教材体系。

2. 教学实践改进与教师发展价值

本课题揭示了日本教材在“跨学科融合”“现代关联”“批判性思维引导”等方面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古诗文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设计思路。教师可借鉴日本教材中“同主题拓展”“训读法实用导向”等策略，推动古诗文教学从“背诵—翻译”模式向“理解—探究—表达”的综合素养导向转型，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力与语言运用能力。

3. 文化传承与国际理解教育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不仅是对两国教材古诗文选编内容的比较，更是对中日文化接受与重构机制的深度剖析。研究成果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自觉与母语教育主体意识，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日文化交流等领域中，为古诗文的海外传播与跨文化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4.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建构价值

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融合定量分析与质性比较，构建了系统的编码类目与比较框架，为后续教材比较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范式。尤其在“古诗文编选”这一细分领域中，填补了系统性、结构化比较研究的空白，拓展了语文教材研究的学术边界。

5. 后续研究方向与推广路径

本课题虽以高中阶段的教材文本为主，但其研究思路与结论可延伸至初中、小学等学段，亦可拓展至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教材比较，形成更广泛的东亚古诗文教育研究网络。未来可进一步结合数字化教材、AR/VR 教学场景等新兴教育技术，探索古诗文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二）必要的说明

1. 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课题聚焦于我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东京书籍版《精选古典探究 [汉文篇]》，研究对象具有权威性、代表性与时新性。尽管未涵盖所有版本教材，但所选样本在课程地位、文化功能与教育目标上具有高度可比性，结论具备较强的解释力与推广价值。

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四、项目组对项目完成情况的自我评价

（一）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评价

自项目立项以来，本课题组紧紧围绕“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比较研究”这一核心主题，以中国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与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为研究对象，严格按照预设的研究框架与进度安排，系统开展了文献研究、理论建构、样本编码、量化统计、质性比较与案例深描等一系列研究工作。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前期与中期的各项任务，研究进度符合预期，成果初具规模，具备良好的结项基础。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课题组始终秉持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注重团队协作与过程管理，克服了资料获取、术语翻译、编码一致性、理论薄弱等多重困难，逐步建立起系统、科学的研究路径。通过反复研讨、编码优化与信度检验，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码体系与数据分析框架，为后续深入研究与成果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体来看，本课题在研究设计的系统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数据处理的规范性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初步实现了从“现象描述”到“原因探析”再到“启示提炼”的研究目标，具备较强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已完成工作的自我评价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构建扎实深入

课题组在项目初期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日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的研究现状，撰写了详实的文献综述，明确了研究空白与创新方向。在理论构建方面，我们不仅引入了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PCK 理论、阿普尔课程文化观等经典教育理论，还结合叶嘉莹“兴发感动”说，构建了兼具认知维度、情感维度与文化维度的多维理论框架，增强了研究的理论深度与解释力。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整合性与适用性，能够有效支撑后续的编码设计与比较分析。尤其在引入“兴发感动”说后，研究在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层面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分析视角。

2. 研究对象明确，编码体系科学严谨

课题组明确选取中国统编版教材 67 篇古诗文与日本《精选古典探究（汉文篇）》78 篇汉诗文作为研究样本，确保研究对象在课程地位与教育功能上具有可比性。在编码设计方面，经过七轮修订与预编码测试，最终构建了涵盖“选文—注释—插图—学习提示”四大维度、三级类目的编码手册，并通过信度检验将编码一致性提升至 0.82，显著高于目标值 0.7。编码体系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较强，能够全面反映教材编选的细节特征。信度检验流

程规范，数据质量可靠，为后续量化分析与对比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

3. 量化分析与质性比较相结合，研究方法多元

课题组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145 篇样本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编码与统计分析，运用 SPSS 软件进行频数、百分比等数据处理，并通过图表可视化呈现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如《登岳阳楼》《鸿门宴》《兼爱》）进行跨文化文本细读与对读，深入揭示两国教材在编选理念、文化取向与教学导向上的差异。研究方法兼顾定量与定性，既注重数据的客观性与代表性，又强调文本的深层解读与文化语境分析，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解释力。

4. 初步成果丰富，研究报告初具规模

截至目前，课题组已完成《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比较研究报告》（约 2.5 万字），系统呈现了研究背景、方法、结果与启示。报告结构完整，内容详实，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阶段性成果。同时，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编码手册、数据表、案例对比等内容，也为后续论文撰写与教学实践转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研究报告在内容深度与逻辑严谨性方面表现良好，具备进一步修改完善并转化为高质量学术论文的潜力。

（三）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反思

尽管项目整体推进顺利，成果初显，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与成果完善中加以改进：

1. 理论应用仍有深化空间

虽然课题组构建了多维理论框架，但在具体分析中，理论工具与实际问题的结合尚不够紧密。例如，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在注释、插图等维度的映射仍显机械，未能充分体现古诗文教学的特殊性；叶嘉莹“兴发感动”说在情感维度的分析中虽有涉及，但在具体教学建议中的转化还不够充分。后续应进一步加强理论工具与古诗文教学实践的结合，如在分析插图时引入视觉修辞理论，在探讨学习提示时融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升理论阐释的深度与针对性。

2. 样本范围与代表性有限

本研究虽选取了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版本，但样本总量仍偏小（共 145 篇），且未涵盖两国其他主流教材版本（如中国人教版、日本光村版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此外，日本教材的使用背景与教学实践信息掌握不足，也影响了对其编选理念的深入理解。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多版本教材进行对比，增强研究的广度与代表性。同时，可通过访谈日本教师或收集教学案例，进一步了解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使

用情况。

3. 文化比较的深度与平衡性有待加强

在对比分析中，课题组虽注意到两国文化差异对教材编选的影响，但在文化心理、审美传统、教育哲学等深层动因的挖掘上仍显不足。例如，对日本“物哀”“幽玄”等美学观念如何影响其汉诗选编，尚未进行系统阐释；对中国“文以载道”传统在当代教材中的体现也缺乏深入剖析。后续应加强对两国文化传统、教育理念与审美心理的跨学科研究，结合文化学、美学、哲学等视角，提升比较研究的理论高度与文化深度。

4. 教学转化与实践应用尚不充分

目前研究成果仍以学术分析为主，虽提出了若干教材编选与教学建议，但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教学案例或教学设计，难以直接转化为一线教师可用的教学资源。后续应加强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设计《高中语文古诗文跨文化比较教学案例》，开发典型课例、教学活动或教学资源包，推动研究成果在实际教学中的落地应用。

（四）未来研究方向与改进建议

基于上述自我反思，课题组认为未来可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与拓展：

1、深化理论融合，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进一步整合教育学、文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理论，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古诗文教材分析模型，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影响力。

2、扩大研究样本，增强结论的代表性与推广价值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拓展至多国别、多版本教材的比较研究，甚至延伸至初中或大学阶段的古诗文编选比较，形成更为系统的研究体系。

3、加强实证研究，提升教学转化能力

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课堂观察等方式，收集一线教学反馈，验证研究结论的实践有效性，并据此开发教学资源，推动研究成果向教学实践的转化。

4、推动成果发表与学术交流

在完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积极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参加相关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研讨，提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价值。

（五）结语

总体而言，本课题在研究设计、方法运用、过程管理与成果产出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初步实现了预设的研究目标。课题组在克服多重困难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科研

管理
意见

教学部长 签字：_____年 月 日

脉相承的正统叙事特征。另一方面,我国教材中政治建设和爱国题材的选文数量多,这类选文渗透“文以明道”文化传统,凸显士大夫心忧天下、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有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此外,教材中儒家经典篇目占比显著,不仅体现出对儒家思想核心地位的推崇,也意在借助儒家思想实现文化再生产、维系社会思想秩序。

日本通过选择性过滤和本土化解读,将汉文化转化为服务于本土审美和跨文化理解的工具,以消弭外来意识形态对本土权力结构的冲击。首先,日本汉文篇教材选篇聚焦先秦诸子和唐代诗文,折射出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结构,即哲学思辨与情感体悟的双重表征。其中,日本教材选篇侧重唐代经典,不仅是因为“唐风崇拜”情结,也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自奈良时代起,汉诗便成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古代日本人普遍形成一种“唐土”情结。^[1]“丽源两国文学史,可以发现以假名创作的日本古典文学深受中国影响,学习中国古典诗文才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日本古典文学。”^[2]其次,日本汉文篇教材对中国古诗文的政治倾向有意地加以过滤,例如,同样选择儒家经典,日本教材选编侧重修身哲学,弱化其政治伦理内涵。这种“去政治化”处理将外来文本纳入本土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汉诗文成为服务于本土文化认同的工具。

2. 两国语言教育理念的差异

中日语言教育理念的差异深刻影响两国教材中古诗文的选编。中国以“文化传承与思想内化”为核心,选篇广泛而深刻。日本则以“跨文化工具与满足应试”为导向,选篇经典而精简。这种差异既是两国母语教育目标的缩影,也揭示了古诗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适应性发展。

中国语文教育将古诗文视为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秉持“以文化人”的理念,强调通过“文言、文章、文学、文化”^[3]融合的教育实践,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

一;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语言构思、形象意蕴、情感等多个角度欣赏作品,获得审美体验。^[4]可见,我国古诗文的教学理念侧重理解应用层面,这也指向系统完整的教材古诗文选编特点。

而日本《平成30年学习指导纲要》将汉诗文编入“古典探究”课程,强调其作为媒介,最终要使学生对日本本国的语言文化传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定位体现出日本教育界对汉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在日本高中教育体系中,汉诗文课程属于选修科目,而非必修内容。日本高中生选择修习汉诗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应对知名国立大学升学考试的现实需求。相比于中国教材注重文化传承和情感体悟的编排思路,日本汉文篇教材在选文上更注重思辨能力培养、审美素养提升及文言能力检测。^[5]可见,我国强调原汁原味的古典语言学习和传统文化浸润,日本更多将汉诗文定位为语言学习的载体和培育现代公民素养的技能工具。

三、中日教材古诗文选文比较的启示

日本汉文篇教材的选文体系有一些特点值得我国借鉴。其一,平衡选文题材的教化功能与审美体验,增加抒情类古诗文以强化个体生命感悟;其二,补充文化转型期经典古诗文,展现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过程;其三,增设跨文化阅读比较栏目,通过不同国家文本互鉴深化文化理解。这三方面启示共同指向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转型,即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增强选文的开放性和对话性。

1. 平衡题材教化功能与审美体验

中国通过“通史式”编排强化民族认同,日本则采取弱化政治色彩的选文方式。正如阿普尔所言,“课程知识与意识形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6],各国教材选文本质是文化权力的重构,其选编呼应国家文化战略具有合理性。在选编题材上,中国统编版教材侧重政治建设、伦理教化及集体价值塑造,日本汉文篇教材突出汉诗文的哲学思辨和抒情审美。这一比较启示我们,选编教材

时,在传承思想深度的基础上,增加贴近学生生活的抒情类题材,既延续传统文化的思想深度,又关注学生的个体审美需求。可考虑在教材中适当增加情景交融的抒写个体生命感悟类的古诗文,调和平衡“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与个体的审美体验。这方面可开发的篇章包括元代散曲中的生活化作品、明清小品文等。

2. 补充文化转型期经典古诗文

日本汉文篇教材高度集中于先秦和唐代,忽视宋代以后的诗文。过度聚焦个别朝代易造成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出现断层或断层。中国统编版教材虽覆盖先秦至明清,以先秦、唐代、宋代为主,但元、明、清三个朝代选文较少。我国教材在维护文化正统性的同时,可以保持选文年代的多源性,增强选文的开放性和现代适应性,弥合学生的认知断层。一方面,可以平衡经典聚焦与文脉完整的选文原则,尝试增加目前篇目数量较少的朝代古诗文,如元、明、清等其他朝代的古诗文。另一方面,可以补充一些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古诗文,如增选具有启蒙思想元素的《原君》(黄宗羲)等文章,展现传统文化向近代思想的嬗变,呼应“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代命题。

3. 增设跨文化比较阅读栏目

中国古典诗文不仅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还曾广泛影响东亚世界,甚至在欧美也有悠远的回响。如果教材增设跨文化比较阅读栏目,有助于学生在国际化语境中,更加明确本土文化的坐标,同时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质。可以在部分古诗文后增加异域作家创作的相关主题文本。例如,在选录陶渊明田园诗时,在栏目中引入《雄鸡日记》(松尾芭蕉)、《函山杂咏》(夏目漱石)等诗作。这些皆是在陶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样追求以简练而富有意境的句子表达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体悟。这方面有丰富的材料可供利用。例如,在白居易《琵琶行》后,可以补充白居易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平易晓畅的风格与日本文学特质高度契合,从而被广泛接受和模仿。学生可以在阅读《源氏物语》《枕草子》等选段后

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的选编差异深刻折射出两国在文化传承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中国强调文化基因的内化,日本侧重应试需求和审美工具性。对我国而言,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可借鉴日本对经典的现代诠释策略。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选取的日本教材样本仅为东京书馆版,未能涵盖日本其他版本教材,无法全面反映日本教材古诗文选编的整体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侧重于文本层面的静态比较,未深入课堂教学实践,对选编差异在教学效果层面的影响缺乏实证分析。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范围,结合课堂实践验证优化路径,为古诗文教育的跨文化互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使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桥梁。^[7]

参考文献

[1]曹慧.中日初中语文教材传统文化选文比较研究[J].语文建设,2020(7上):72-76.

[2]黄宗羲.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J].外语教学,2012(3):94-100.

[3]刘亚明.王.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11.

[4]丁利.余英时:“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知远.风月同天:日本高中语文课程中的中国古诗文[J].语文学习,2020(6):4-9.

[6]黄厚江.文言文该怎样教[J].语文教学,2006(5):14-16.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8]林敏子.高等学校国語科「言語文化」の古典研究にむかふ漢文教材:傾向と扱い[J].早稲田教育評論,2023(1):77-91.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日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编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JC2405)研究成果】

